

##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主要人物及其悲剧分析

تحليل الشخصيات الرئيسية في رواية "الغزال الأبيض" للكاتب الصيني تشين جونغ شي

الباحث /يوسف محمد فرغلي عبد العاطي

### الملخص

رواية "الغزال الأبيض" هي باكورة أعمال الكاتب الصيني تشين جونغ شي ويعتبرها الكاتب الصيني أول أعماله الناضجة. العديد من الباحثين يعتقدون أن رواية "الغزال الأبيض" وصلت الى مستوى جديد من العمق منذ ظهور الرواية في الفترة الاخيرة ,وهي تكسر وجهة النظر التي توجي بأن تمثيل الشخصيات يكون عن فئة واحدة و أدب محدد غي عصر واحد, كما تفتح الرواية عالماً مفتوحاً بشكل غير مسبوق من الابداع الادبي لم يحدث منذ زمن بعيد, امتلئت الرواية بالموضوعات الجدلية و المراجعات الحماسية , عبر المؤلف عن قوة الشخصية الوطنية و أجاب عل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تساؤلات عن المجتمع الاقطاعي الصيني والذي امتد لأكثر من ثلثمائة عام و التغيرات التي طرئت مع مرور الوقت , يعتقد الكثير من الباحثون أن رواية الغزال الابيض هي علامة فارقة في المسيرة الفنية للكاتب الصيني تشين جونغ شي و أحد الاعمال المهمة في الادب الصيني , يحلل هذا المقال الشخصيات الرئيسية بالرواية وهي باي جياكسوان ، لو زيلين ، السيد تشو ، هيو لدراسة تأثير الثقافة الكونفشيوسية علي المجتمع الصيني قبل وبعد ثورة ١٩١١

:Abstract

"Bailuyuan" is Chen Zhongshi's first novel. The writer believes that it is the first truly mature works. Many theorists believe that "Bailuyuan" has reached a new height and depth since the

appearance of novels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It breaks a stubborn view that there is one representativeness in one class and one literature in one era. It also opens up an unprecedentedly wide world for literary creation. Ever since a long time ago, the novel has been full of controversy and rave reviews. It wrote the national personality power and answered why Chinese feudalistic society could exist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years. As time went by, more and more people believe that Bailuyuan is a remarkable milestone on the way of Chen Zhongsh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work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s of Bai Jiaxuan, Lu Zilin, Mr. To Zhu, Heiwa and their tragedies in " Bailuyuan " novel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Chinese society before an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 1-儒家文化忠实执行者——白嘉轩

白嘉轩是作者刻画得非常成功的一个儒家文化力行者。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儒家文化精神的传承者。但在作品中，作者更加强调了他人格中高尚的另一面。他的重义轻利、达观宽容是对于权势物欲的贪婪追求

的一种制衡，尽管白嘉轩在白鹿原的政治舞台上默默无闻，但却是维系白鹿村民心的核心，这种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民族的维系纽带，也是白嘉轩这个人物性格丰厚深刻的地方，作者对他身上正直、仁义的儒家人格抱以赞颂的态度<sup>1</sup>。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具有宗法家族制度所赋予的或有形或无形的至高权力。说其有形，是指祠堂之内他是众人拥戴的执法者，是伦理道德观念最具权威的监督者；说其无形，是指他在族中乡民的心理中，具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心理畏惧，他的言谈举止具有示范性和感召力。这种有形与无形构成乡间同而化之的宗法力量，维系着小农经济下的封建秩序。白嘉轩的一生，就是实践儒家思想的一生，他骨子里流淌的都是儒家的血。他带领村民们学习和实践朱先生所编撰的那部过日子的章法——《乡约》。他重视教育，不惜大动土木，把祠堂整修一番作为校舍，并为开学进行了庄严而隆重的仪式。无疑，白嘉轩在小说中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他在关中地区小小的白鹿原上用传统的儒家文化创造

---

王渭清.《白鹿原》人物形象的人格治疗学意义探微[J].西南民族大学报,<sup>1</sup>

2003。

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但白嘉轩作为族长并没有像鹿子霖那样的政治热情，相反表现出他对政治的漠不关心。这点从他去西安城看望其女白灵的事件中可以看出。白嘉轩告诉白灵要么在城里好好读书，要么就老老实实回家，不要整天在城里瞎跑。到后来白灵回家时，白嘉轩却把白灵锁起来，不让她去西安参与革命。读完整部书，不难看出作者是在褒扬白嘉轩，特别是和鹿子霖相对比。因为白嘉轩身上体现着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精髓，但他身上也有封建传统文化的顽疾。就像白灵说的：“他不悦意他不爱听，我偏说给他听，冲一冲他那封建脑瓜子。”作者通过白嘉轩的形象描绘出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既肯定了传统儒家文化，又批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新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阻碍作用。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有时间对他的锤炼，又有空间对他的展示，如果按照20世纪西方小说理论提出的“扁平人物”和“圆型人物”的理论，白嘉轩无疑是后者。

白嘉轩，这是《白鹿原》中着墨最多，内蕴丰富的悲剧性人物。他与朱先生处于同一文化价值体系之中，二

者相比较,如果说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理想、文化精神的象征,那么白嘉轩则是儒家文化实践的代表;朱先生的性格更多地是从“奇”中凸现,白嘉轩的性格更多地是从“世俗”中显示:朱先生的奇文、奇言、奇行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治国平天下”,白嘉轩世俗生命的价值向度主要在于“修身齐家”,这个“家”既是家庭,更是家族;朱先生的精神世界更多地体现为儒家的社会历史观念,白嘉轩的精神世界更多地体现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朱先生是白嘉轩的“圣人”和精神领袖,白嘉轩则是朱先生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现实典范。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价值核心都是以儒家的“仁义”为基础的民本主义<sup>2</sup>。在《白鹿原》中,这两个人物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地成为儒家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的典范。《白鹿原》把白嘉轩放到惊涛骇浪的历史背景中去刻画。作品抛弃了传统意识形态教条,从文化存在角度,从“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的角度,把一个血肉丰满的生命,把一个勃勃躁动的灵魂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艺术世界之中了。白嘉轩是一个具有相

---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sup>2</sup>

当深刻的现实主义内涵的典型人物,而不是如有的评论者认为的那样,是所谓的理想化、理念化的人物。构成这一人物的生命运动轨迹和性格内涵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首先是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他的农民的社会地位。这就决定了他对土地的依赖和迷恋,也决定了他的农民意识,积极的和消极的。其次是他的家族传统。这方面,对白嘉轩的性格和人生有强大影响力和制约力的至少有两点:其一,是白家一个槐木匣匣的“故经”,即白家由败家到中兴的历史故事所蕴涵的发愤图强的精神。传递这个故事成了白家的一个家规,而且影响着白鹿原人的精神世界:“白家老大败家和老二兴业发家的故事最后凝炼为一个有进口无出口的木匣儿,被村村寨寨一代一代富的穷的庄稼人咀嚼着品味着删改着充实着传给自己的后代,成为本原无可企及的经典性的乡土教材……”<sup>3</sup>其二,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富”,即白家立家、立身的“纲纪”。由白嘉轩上溯五辈,大约是白家家道中兴的一个纪元的开始,那位先人白修身在贫困冻馁

---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sup>3</sup>

中读书自饬考得文举,重整家业,重修族规,从此,白家“无论家业上升或下滑,白家的族长地位没有动摇过,白家作为族长身体力行的族规所建树的威望是贯穿始终的”;从而在这过程中也留下了“白克勤”的名字和事迹。由此,白嘉轩的爷爷、父亲同盘龙镇中药收购店掌柜吴长贵的那种深情厚谊,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及白嘉轩同鹿三那种“一家人”的情感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也正是因此,他们之间的那种经济关系被掩盖了。第三个因素就是白嘉轩的社会角色:族长。他那凛然的气质,他对自己人格和威望的维护都来自于此。朱先生的妻子、白嘉轩的妹妹曾对白灵说“你爸苦就苦在一张脸上,孝文揭了他脸上一层皮,你接着再揭一层。”这里的“脸”即指族长的面子和威望。白嘉轩一生有四件“壮举”:其一是“鸡毛传帖”,发起“交农”运动;其二是大旱之年充当“马角”为民祈雨;其三是修祠堂,立“乡约”;其四是造塔镇“妖”。这是四件性质不同的事,但都是与其族长地位有密切联系的,而且也为其性格的显露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构成其性格内涵和生命运动轨迹更深刻的内在因素

还在于其文化背景, 即其代代生存于其中的传统文化土壤。这其中包括他的农民地位、传统承袭和族长社会角色, 而更直接更重要的还是朱先生所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同时, 上述因素也铸造了白嘉轩顽强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精神, 他那“又直又硬的腰杆”既是其族长权威的显示, 也是其人格精神的象征。<sup>4</sup>

由此我们可以说, 白嘉轩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宗法文化造就的一个人格典型, 他的身上包容了儒家传统正面和负面的丰富价值内涵。白嘉轩是传统文化、传统礼教的代表而不是阶级的代表。这一典型的出现, 在当代长篇小说中是空前的、独特的, 具有巨大艺术价值的。

作为一个悲剧人物, 他的悲剧是政治性的, 更是文化性的, 具体地说则体现为家族的悲剧、人生的悲剧和人性的悲剧, 且三者是交融在一起的。白嘉轩以“耕读传家”、“学为好人”为生活准绳, 秉持朴素的具有儒家色彩的民本思想和民主意识, 竭力游离于现代政治斗争之外,

---

尤龙. 极端的教育. 因袭的负重——白嘉轩家长文学形象解读[J]. 青年文学家, <sup>4</sup>

2010, (16) .

但是现代政治风云却一次又一次把他卷入斗争的漩涡之中,他无法摆脱更无法作彻底的反抗。民国初,反对苛刻的印章税,他带头组织“鸡毛传帖”,掀起“交农”事件,形成了民国后白鹿原上的第一次政治风潮。白嘉轩的人格、人性也就在这次风潮中闪烁出独特的光彩。然而,这是一次“逼上梁山”,是政府“把刀架到农民的脖子上搜腰包”,“庄稼不能做”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即使如此,他也有过“这样弄算不算犯上作乱?算不算不忠不孝?”的疑惑。此后,白嘉轩只能在政治的浪涛中风雨飘摇了。镇嵩军乌鸦兵进驻白鹿原,在乌黑的枪管的威逼下,白嘉轩敲锣集合村民,观看充满血腥气的强行征粮“仪式”:射“鸡”表演;农运兴起,白嘉轩惨淡经营的祠堂被砸开,“仁义白鹿村”石碑、“乡约”石刻被砸烂,这不次于挖了他的祖坟;田福贤复辟,又强行“借”用戏楼,演出了一场血腥的“耍猴戏”(折磨、屠杀农协骨干),“白鹿村的戏楼这下变成烙锅盔的鏊子了!”<sup>5</sup>白嘉轩只能发出无力的悲愤和哀叹;鹿子霖亦步亦趋学习田福贤也在戏楼上“耍猴

---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sup>5</sup>

”，白嘉轩曲膝下跪代族人赔情受过，要求放过被惩处的农协会会员；黑娃土匪洗劫白鹿村，不忘记打折他那“挺得又直又硬的腰”；黑娃为小娥复仇又差点儿错要了他的命

... ..

如果说政治浪涛摧残的是他的肉体，压榨的是他的生命，那么家族中的叛逆轰击的则是他的灵魂，毁伤的是他的生命的依托。这主要是指白孝文和白灵。白孝文和白灵的“叛逆”方向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堕落，后者是投身革命洪流，但在白嘉轩看来，二者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对家族传统和“纲纪”的背叛，对宗法和礼教的背叛，对他所维护的文化体系的背叛，给他的打击都是致命的。由鹿子霖的“闲话”白嘉轩了解了白孝文同小娥的私情，当他来到小娥的窑窗前，知道了里面发生的一切时，“白嘉轩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终点，猛然狗式的朝前一纵”，昏死在雪地里。女儿参加革命，他坚决反对，斥骂之为“海兽”；女儿归来，他把女儿锁在家中，要尽快将其嫁人；女儿逃出，他对所有的人都说一句话：“她

死了!”对他来说,他们的背叛对他精神的轰击比他政治上遭受的折磨不知要沉重多少倍!

在现实生活中,人既在追求目的,又在制造枷锁,为自己也为他人。这就是人的现实存在的悲剧的两面性。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提到的:每个历史阶段的人既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又同时是剧作者<sup>6</sup>。白嘉轩既是悲剧的承受者,又是悲剧的制造者。这既体现了生活的逻辑性和历史的必然性,更暴露了儒家传统的两面性,尤其显示出白嘉轩由儒家传统塑造的人格、人性的两面性。族长的地位,他所维护的礼教,他所秉持的传统观念,既铸造了他人格中的刚直、正义、仁爱,也凝聚了他人性中的僵硬和冷酷。这种僵硬和冷酷在与他人构成的“社会关系”中,在矛盾冲突中才能存在,这种“存在”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出现的时候必然直接或间接参与悲剧的制造。白灵冒死参加学生救护队,不同到城里找她的白嘉轩回白鹿原,白嘉轩骂白灵是“海兽”;成为革命者的白灵理所当然地拒绝包办婚姻,白嘉轩为了那张“

---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sup>6</sup>

脸”，当着族人宣布：“白姓里没白灵这个人，死了！”并从此把白灵的名字从家庭和家族中抹掉了。白孝文被鹿子霖引入歧途，白嘉轩残酷地对其施“家法”，并强迫分家，促使白孝文走上另外一条人生之路；大饥荒年月，白孝文沦为乞丐，濒于死亡的边缘，白嘉轩仍无丝毫的怜惜之情，只是在白孝文当了县保安团营长以后回乡祭祖时白嘉轩才重新接纳了他，因为“白嘉轩从族人的热烈反响里得到的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心理补偿。”白嘉轩的冷酷尤其表现在对小娥自始至终的迫害上。小娥与黑娃结合，找到了自己满意、合理的归宿，但却被白嘉轩视为异端、败类，不准入祠堂，即不承认其家族地位。被封建礼教浸透了灵魂的鹿三杀死小娥，白嘉轩对鹿三说：“你不该杀死黑娃媳妇”，同时又说，“坚决不能后悔。这号人死一个死十个也不值得后悔，只不过不该由你动手。”白嘉轩的虚伪和冷酷在这里暴露得一览无余。其实白嘉轩早已参与了对小娥的屠杀，精神的和肉体的；他是真正的刽子手，鹿三不过是以自己的行动成为白嘉轩实现秩序欲望目的的工具而已。

在白嘉轩的僵硬和冷酷里，我们看到他的人性在封建礼教的冷水浸泡中已彻底扭曲、异化，在他精神的天平上，人性与礼教的比重是完全颠倒的。

历史的车轮裹挟着生活的善恶美丑，翻滚着血腥的浪花呼啸着前行，也把白嘉轩的信仰、依托碾得粉碎。

同朱先生一样，他一生的理想、追求、惨淡经营的一切都被历史的潮流、生活的潮流击得稀里唏啦，“无可奈何花落去”，成为从内到外的一无所有者。最后，当“学为好人”的黑娃被他的儿子白孝文以阴谋手段卑鄙处死时，他“气血蒙目”，瞎了一只眼。大病一场之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气色滋润柔和，脸上的皮肤和所有器官不再缩紧，全都现出世事洞达者的平和与超脱，骤然增多的白发和那副眼镜更增添了哲人的气度。他自己一手拄着拐仗，一手拉着黄牛到原上放青，站在坡顶上久久凝视远处暮霭中南山的峰峦。”这是一个“灵魂”出窍、回归“自然”的可悲可叹的现象。建国后的合作化运动中，白嘉轩又成了“绊脚石”和“顽固派”，这已经是他的悲剧的尾声了。

## 2-儒家文化中的功利主义者——鹿子霖

在作品《白鹿原》中，鹿子霖这个人物形象的个性也是比较突出的，他是小说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主要人物。他一生经历风雨，也过得够精彩，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虽说没有白嘉轩那样的气概和胸襟，却也颇具个性，可圈可点。他表面上慈眉善目，偶尔还与孩子们开开玩笑，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性格极端复杂的人；是一个追名逐利、阴鸷、淫乱、孱弱、龌龊、卑劣、丑恶、充满私欲的人。

鹿家祖辈以卧薪尝胆，定要出人头地的欲望与决心，积攒下可以与白家相抗衡并炫耀于世的产业家财。积淀于鹿家血脉传统之中的个人奋斗因素与“让别人伺候自己”的理想也就成了鹿家在白鹿原得以生存的壁上观，同时也是时时警醒鹿子霖的家训信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是鹿子霖提醒自己与教育孩子的理念，但源于性格的弱点，他又时时刻刻脚软。在历经大起大落，见到过各色人等，坐过牢，上过数以十计的女人的床，经受过儿子的“牺牲”和背

叛等等后，不仅未能使他风光起来，甚至使他的花样把戏不断败露而丑陋面目越来越清晰了。正因如此，由鹿子霖在政治上的种种得失、与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分分合合的关系在作品中显得真实可信，生动地描写出不同时期政治活动的复杂性与长期性。鹿子霖的活动与他的个性相互契合并由此展开，形成一条重要的副线，有效地写出了鹿子霖其人。

首先在政治活动中的鹿子霖，跌宕起伏。在政治风波波及白鹿原以后，同白嘉轩那种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状态相比，鹿子霖跃跃欲试，并被任命为乡约。参加了半个月培训的鹿子霖平步青云，剪掉辫子，穿上制服，洋洋自得、心花怒放而又刻意保持低调的模样回到原上：“在县府受训。满了。十五天满了。这衣裳……制服嘛！”回到家后，他忍俊不禁对孩子说：“爸革命了。”<sup>7</sup>革命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他不知道。更别谈什么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了。革命在他看来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sup>7</sup>

是一种手段，是一种成为人上人的资本，乡约是官，当官让他志得意满，可以让乡民臣服于他。从鹿子霖的心态中也反映出当时的革命宣传的不到位，让别有用心之徒得以钻了空子，迷惑群众。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光耀门庭的思想让他在创建了保障所，放了“草炮雷子铕子”后，倍感告慰老太爷“中一个秀才到我坟头放一串草炮，中了举人放雷子炮，中了进士……放三声铕子”的在天之灵。

此后，鹿子霖以奴才心理和行为的“知恩图报”，成为田福贤的爪牙。他因抓到了保障所乡约的大权，便大吃二喝地大搞乡约挂牌仪式，并以“建立革命新秩序”为名传达收取“印章税”等等款项的规定。这实质上是他在向白鹿村村民示威，也是他和白嘉轩较劲儿、给白嘉轩下马威的一招。上任后他参加的第一次政治活动是破坏交农运动，帮助半路

上窜出来的史县长强迫乡民缴纳农业印章税。当他领着田福贤堵住白嘉轩家门口，想要让农民运动失去领袖而流产时，他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攀上了国

民党这个好靠山，能光耀门庭，飞黄腾达，至于是否有违于自己的本分或者伤害同乡人的利益，这一切都无所谓。由此可见鹿子霖对功名利禄的迫切需求，是一个无耻的利禄之徒。

随后，原上的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国共两党“你唱罢来我登场”。鹿子霖也跟着时沉时浮，顺着大潮不断漂浮。但无论如何，保住“乡约”的位子是他得意的资本。因此，他愿意被田福贤随意使唤。儿子不幸被捕了，他反而痛心疾首地捶头顿足：“活该！死得！把这孽子拗种处治了，我倒好说话，好活人了！”<sup>8</sup>反衬出他对“道不同不相为谋”、老是连累他、让他的苦心钻营成为泡影的共产党儿子鹿兆鹏的不满。在这他并未注意到家庭伦理，没有意识到家庭的生命是一脉相承的整体，他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而儿子的生命又是他个人生命的延续。在他看来，亲情永远比不上乌纱帽重要。有乌纱帽就有了他的一切，没有乌纱帽就没有他的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sup>8</sup>

一切，这就是典型的社会蛀虫的本性，不管是在怎样的社会里，他都会必然地成为这类蛀虫。

在受到鹿兆鹏牵连而被罢职的时候，鹿子霖气急败坏、坐立不安，感觉天都要塌陷了，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厚着脸皮找田福贤诉苦，渴望官复原职。“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思想控制着他，一切为了做官，做官为了一切，有了官位就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失去乌纱帽则连生存的乐趣都没有了。当他官复原职时，他更加忠心耿耿了。不遗余力、心狠手辣地帮助田福贤在戏台“耍猴”——整治农协成员，凸显出狗的本性。正如鲁迅先生认为，中国国民的恶劣性在于主奴相通，他曾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则奴性十足。”鹿子霖的奴性表现在缺乏主人意识，对权势的不假思索、惟命是从，将身家性命的荣耀绑在虚无的官位上。

但鹿子霖的共产党儿子总让他难以应景应时。岳维山枪毙了共产党郝县长后，要挟他去城里找寻鹿兆鹏时，他无所适从。只好灰溜溜找到在城里当国民党连长的

二儿子鹿兆海，鹿兆海拉上团长带着枪到原上在岳维山面前威风了一把。鹿子霖回乡时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了。田福贤一针见血地讽刺他：“（鹿兆海）是个吃粮的粮子，能在这驻扎一辈子？”他立马发现“自己目光短浅”<sup>9</sup>，强龙岂能压住地头蛇？后来鹿兆海“牺牲”了，没有了靠山的他真正陷入两难的境地。从此又摇尾乞怜，夹起尾巴做人。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本事，无人能及。

抗日战争胜利后，鹿子霖改任保长，协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剿共和征丁征粮”，尽管他上窜下跳、忠心耿耿，但最终还是因为鹿兆鹏是共产党的原因而未能逃过牢狱之灾。没有任何人出面保释他，在“磨没了对田福贤的期望”后，他这一跤在监狱中跌得遍体鳞伤，历尽人生的酸苦辣涩。

两年零八个月后，鹿子霖方才出狱，回到因为保释他而被妻子鹿贺氏千金散尽、只剩残垣断壁的家。至此他似乎才明了朱先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sup>9</sup>

生所说的“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这句话的含义。至交田福贤一直没来看他，他尽尝了事态冷暖。特别是牢狱之灾使他参透悲欢离合，彻悟成败荣辱，洞明是非得失后，按道理这个时候的鹿子霖应该能看透世事，收敛旧时所为，平和地按本分做人行事。可生活总不会老老实实按照既定的轨道行驶，所谓“人生弯弯曲曲水，世事重重叠叠山”。这时，他的生命又重现亮光——他一直未知的鹿兆海的媳妇带着孙子回来认亲，真是“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孙子的出现让他欣喜若狂，以前一直忽视的亲情在他落魄潦倒时又被重拾起来，他的人性暂时得到回归。他感觉到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家产、权势，而是人。但是在带媳妇去给鹿兆海上坟时，他发现有人“不惜冒险爬上碑石顶端拉屎拉尿”，顿时气愤得涕泪纵横：“人还是不能装鳖哇！装了鳖狗都敢在你头上拉屎……”在没有权利附身时，他迫切感受到权力带给他的曾经的荣光，他要重拾辉煌。之后，他又回到白鹿联保所，“当无赖装死狗”继续他的营

生，可见他“官瘾比烟瘾还难戒<sup>10</sup>”。这回除了争一口气外，还为了给小孙孙讨食。看来只有权力才能带给鹿子霖生存的希望。

但是最终，鹿子霖还是被这权力收拾了性命。解放战争结束后，在处死岳维山、田福贤、黑娃的集会上，鹿子霖被迫陪斗，当场吓得屎尿俱下，精神失常，失去最起码的自理能力。一直相信他的半边屁股比自己的整个脸面有用的妻子鹿贺氏也因逐渐厌恶而放弃他，他最后在寒冷的冬夜孤独死在柴火房里。这是追随国民党反动分子、毕生机关算尽、阴险狡诈的鹿子霖的悲剧性下场，也是一切社会蛀虫必然的下场。

其次在生活上的鹿子霖，作风让人难以恭维。这个表面上的正人君子，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男盗女娼的事；当面衣冠楚楚，背地里却是一个见了女人就连自己的裤头都管不住的人，还有什么人格魅力可言？在小说末尾，他在原上四处认“干亲”。用他的权力为这些私底下结出的果“逃壮丁”，可见他私生活长期的淫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10</sup>

乱、不检点。小说前面没有明说，但从他趁人之危霸占田小娥的情节描写可“窥一斑而见全豹”。甚至在自己的家中，醉酒后无意猥亵守活寡的大儿媳妇，又借他的老谋深算给媳妇施加压力，导致精神压力过大的她患上“淫疯病”而被父亲冷先生下哑药，最终悲惨死去。这都和鹿子霖的卑劣行径脱不了干系。他的下场如此非同常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鹿子霖的活动这条副线中可以看出，在白鹿原这个宗法制的社会中，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宗法“仁义”的幌子下混水摸鱼，干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勾当。鹿子霖的坏、心思的缜密，一般人少有，不写并不代表不存在，小说对他的描写体现得非常到位，让人意想不到。

整部作品中，鹿子霖的不齿行为昭然若揭。但是，作者并没有将这一人物简单化----恶则皆恶。如他酒后对儿媳动手动脚，但醒来后能迅速冷静下来，并及时的制止了儿媳的失检行为。但尽管如此，鹿子霖这一形象

仍是卑猥和丑陋的，他最终的发病致死也是他最好的结局！

### 3-儒家文化精神的漂泊者——黑娃

《白鹿原》从文化的层面深入探索了中华民族命运的生存方式。小说主要表现人与环境的对立冲突，即人与历史及文化的复杂关系。在这个关节点上，作者对儒家文化全部要义进行深刻的解析，揭示它对民族历史命运的发展和个体生存的影响。其中，对儒家文化的反思是贯穿作品的重要内容而黑娃则为作者提供了审视儒家文化弊害的最佳角度。黑娃在作品中出现时，“仁义”白鹿村已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地”，白嘉轩和他的精神之父朱先生以其感人的仁义之举不断地诠释着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其精神的感召下，整个白鹿原呈现出一派旧有的生活秩序，弥漫着友好和谐的气氛。然而，生活在其中的黑娃却是一个异数，表现出对“仁义”的本能拒斥。他从小顽皮好动，不愿念书，看不起鹿子霖卑劣的人格，更看不惯恩人白嘉轩一副凛然正经的神情和挺直的腰杆。父亲送他进学堂，目的是想将他野性顽皮的劣根性改掉，把

他培养成白嘉轩所期望的“谦谦君子”。但黑娃无法忍受念书的枯燥与寂寞，而财东娃鹿兆鹏施舍的冰糖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而又痛苦的记忆。对于白嘉轩，黑娃“无法拒绝那只粗硬有力的手，一直把他拽进学堂。那只手给他留下了复杂的难忘的记忆”<sup>11</sup>。出身的低贱及生活的贫困使黑娃产生了自卑与失落感，进而刺激他形成倔强不屈的个性，使他本能地与命运抗争。黑娃最初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成为像白嘉轩、鹿子霖那样的财东，于是，他开始了改变自己命运的人生之旅。此时的黑娃，单纯透明，流露出人的自然天性。这种与生俱来的个性，与白嘉轩所遵循的“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信条背道而驰。外出“熬活”是黑娃叛逆的起点。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黑娃受压抑的情感被释放出来，在白鹿原刮起了一场“风搅雪”式的农民运动，并很快成为农民运动的带头人。由于国共分裂，革命受挫，黑娃背井离乡。凭着机敏，他做过习旅长的警卫，后不得已投靠土匪，被推举为匪首“二拇指”。“大拇指”被害后，黑娃受降招安，成为县保安团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11</sup>

炮兵营营长。滋水县解放前夕，他率部起义，当上了人民政府的副县长，但仅过半年又遭白孝文暗算被枪毙，走完了自己坎坷动荡的生命历程。

考察黑娃的一生可以发现，在其桀骜不驯的外表下，始终涌动着的一颗骚动不安的心，这就是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其中夹杂着对现存制度和传统文化的不满。但是，低贱的地位、不屈的个性，使他在实现自我价值时出现了偏差，使他以叛逆的方式实现了对现存制度和文化的超越。但无论是身为农民运动的领袖还是红军战士，或是沦为土匪，他都不自觉地偏离了主流社会文化的中心，成为社会制度及文化的叛逆者。在作品中，作者形象地揭示了儒家文化与人性的冲突及其对人的生命力的压制。黑娃身上洋溢着一股强烈的生命气息，处处表现出与儒家文化相对立的人性内涵。陈忠实用这样优美的语言描述黑娃：“他的眼睛里透出一股豪恨之气，……双臂粗壮如椽，胸部的肌肉盘皆成两大板块，走起路来就有一股纠越的气势。……他与小娥居住的窑洞显示出一股争强

好胜的居家过日子的气象。”<sup>12</sup>黑娃与田小娥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是作者大笔书写的人性乐章。他们不守礼俗，两情相悦，其婚姻还原了男女间娱情悦性的本色，而与建立在生儿育女基础上传统的婚姻模式相去甚远，因而遭到了白嘉轩等人的强烈反对。仁义村容不下这对恩爱夫妻，但是“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这是整个白鹿原遭人鄙视却令人羡慕的最幸福的一对夫妻。在这里，作者对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给予了如诗如画般的描绘。黑娃的金刚怒目，敢作敢为，颇似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秉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无拘无束，率性而为，敢于与既成的规范相抗衡，他与白嘉轩、鹿三恪守的儒家伦理道德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这一形象身上，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人情人性美的礼赞，也折射出儒家文化对人性的贬抑，这是黑娃独特的价值所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仁义，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虽不乏博爱因素但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所谓的“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的伦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12</sup>

理秩序。孔子言：“孝悌也者，为仁之本与”<sup>13</sup>。人与人之间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遵从关系。从家庭关系入手，建立一种规范的伦理秩序，是仁义的核心内容。儒家文化蔑视甚至否定人的自然属性，将人的本能欲求视为洪水猛兽加以无情的压制，以此来维护既成的伦理规范要求。陈忠实拂去儒家文化表面温情脉脉的面纱，令其残忍冷酷的本质浮出水面。在《白鹿原》中，无论是白嘉轩还是朱先生他们都是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自觉维护者，他们虽有着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但在惩治小娥时他们却毫不留情，将其置于死地，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逼黑娃就范。当黑娃最后真正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皈依时，精神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萎缩成为一具道德文化的空壳。在作品中，黑娃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儒家文化的种种弊端，蕴含着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意识。

陈忠实曾说：“当我第一次系统的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性境界，甚至连‘反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13</sup>

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的偶然的判断的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了。所有的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各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的演变过程，也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我不过是竭尽截止到一九八七年底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我上述的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的”<sup>14</sup>。陈忠实在小说中通过黑娃形象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但作者并未到此为止，而是把人物放置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背景下，细腻地描绘了黑娃在革命浪潮中的沉浮，表达了作者对社会革命的深刻思考。黑娃与田小娥度过了短暂的幸福时光以后很快被卷入农民革命的风暴中。一场“风搅雪”式的农民运动，使昔日平静的白鹿原沸腾了，黑娃叛逆的个性在革命风暴中得到酣畅淋漓地表现。革命将他原有的自卑心理和对白嘉轩、鹿子霖的不满激发出来。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涨热情，放火烧粮台，办讲习所，与他的革命三十六兄弟惩处恶霸，砸烂祖宗牌位，捣毁乡约以及斗争田福贤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14</sup>

等□将白鹿原的革命推向了高潮。黑娃堪称革命的弄潮儿□不愧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而辉煌革命生涯也预示着他在叛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作者真实地揭示了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革命顺应农民的天然要求□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变成自觉的革命要求□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等口号喊出了一代农民的心声。然而□在革命过程中□黑娃砸牌位、毁乡约的举措令人痛心、发人深思□表达了作者对现代革命文化弊端的批判态度。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在反传统中进行的□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在摧毁旧制度的同时□也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是“五四”新文化产生的基础；30年代的革命文化又继承了“五四”传统；十年“文革”则是对传统文化及新文化传统的全盘否定。革命浪潮一次次地冲击着传统文化□最终将其连根拔掉□造成了文化领域内的一片荒芜景象。关中大儒朱先生的一句“折腾到何日为止”□总结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灵魂“折腾”现象也成为这段“民族秘

史”的实质。“文革”中白鹿书院沦为养猪场，既而又成为造反派武斗的场地，连已谢世的朱先生也未能躲过这场浩劫，他的遗骸被挖出受到红卫兵的批判。这种刨祖坟式的“革命”行为暗示着历史的轮回。对革命历史的讲述，流露出陈忠实对传统文化的眷念和哀悼之情，也包含着作者对革命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与作者的痛惜心态相比较，黑娃等人的革命行为显得那样滑稽可笑，农民运动似乎只是一场闹剧而已。事实上，黑娃的革命实质并未超出阿Q的局限性，在对革命的热情中夹杂着盲目与冲动，他被革命的浪潮裹挟着被动地前进，最终被以革命的名义枪毙，与阿Q的结局又何其相似。在思想感情上，黑娃更热衷于革命，然而这个革命最忠实的拥护者最终却成为革命的死敌。他的死固然有白孝文的原因，但其身上不光彩的“历史”已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黑娃革命的引路人鹿兆鹏始终未露面，就是最有力的暗示。他背叛了传统，又与革命文化疏离其特殊的革命经历及其悲惨结局，形象地再现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

复杂性。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审视这段历史，力求对革命历史本质作出新的解释和客观的评价。

陈忠实对于民族命运的描绘，还在于形象地描绘了人与文化连肢连体的依附关系，呈现出中华民族艰难的“寻父”历程，从中展示了中国人的生命方式及其生存困境。作者运用相当多的笔墨叙写了黑娃对儒家文化的皈依。匪首“大拇指”被鹿兆鹏害死后，黑娃经历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在国共两党的殊死搏斗之际，黑娃终于看清楚自己的暗淡前途和命运，接受了白孝文的招安，主动融入主流社会。黑娃在第二次婚姻中选择了老秀才知书达理的女儿，“知书达理”表明黑娃进一步认同了儒家的文化价值体系，并在此确立自己的文化人格。新婚之夜“他的眼前浮现的是小娥那张眉目活泛生动多情的模样。……黑娃的心情变得更加糟糕，他觉得自己十分别扭，十分空虚，十分畏怯，十分卑劣。……”。与小娥见不得人的偷情以及在山寨与黑牡丹的龌龊勾当完全使他陷入了自责和懊悔。……黑娃久久地坐着抽烟，看着炕头并排摆着一双鸳鸯枕头，更加卑

怯到无力自持的地步”<sup>15</sup>。在这里，儒家文化的理性之光不断拷问着黑娃的本能欲望，这无疑是在文化与人的情感欲望之间的冲突，对于黑娃来说，无异于一场灵魂的炼狱。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自卑。最后，黑娃幡然醒悟，投到朱先生的门下，虔诚地拜师念书，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他向朱先生表明心迹：“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黑娃终于对自己的前半生予以彻底否定。以后，“黑娃每日早起借着蒙蒙的晨曦舞剑，然后坐下诵读《论语》。……每隔十天半月去一趟白鹿书院，向朱先生诵背之后再说自己体味的道理。……朱先生仰起脖子慨叹道：‘想不到我的弟子中真正求学的竟是个土匪胚子’”。从此，“黑娃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他几乎残忍地摒弃了原来的一切坏习气，强迫自己接受并养成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傲不逊的土匪胚子。”渐渐地，黑娃的言谈开始雅致，举手投足也显示出一种儒雅的气度。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15</sup>

时机成熟后，黑娃回乡祭祖。他见到白嘉轩时的第一句话便说“黑娃知罪了”。祭祖时他声泪俱下：“列祖列宗，不孝男儿鹿兆谦跪拜祖宗膝下，洗心革面学为好人，乞祖宗宽容”<sup>16</sup>。看到曾经被自己砸碎现在重新镶嵌的乡约，黑娃顿然想起作为农协总部的这个祠堂里所发生过的一切。他羞愧难当：“那断裂拼凑的碑文铸就了他的羞耻”。接着他又和新婚妻子一起在白鹿村跪拜诸多长辈。黑娃以其真诚的忏悔为族人所接纳，重新回到了白鹿原主流社会的中心，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在这里，作者揭示了人与文化的深刻联系。

对于儒家文化精髓的叙述和张扬是陈忠实着力表现的又一重要内容。在作品中，儒家文化的精髓主要是通过一种文化人格来完成的，这种文化人格体现在白嘉轩、朱先生等人物身上。在对这些艺术形象的描绘过程中，充溢着作者对儒家文化所造就的理想人格的敬仰和向往。小说通过黑娃修身做人、脱胎换骨的书写，树立了一座“圣贤文化神话”的纪念碑，表达了作者对传统文化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16</sup>

的仰慕和赞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政治、人伦精神、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生活观念和社会习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根底。在中国广大农村，对农民真正产生影响的首先不是政治观念，而是世代流传下来并不断得到完善的乡规民约，它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由此形成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的超稳定性。在“礼仪之乡”的白鹿村，由朱先生亲书的《乡约》中最重要的一条：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是儒家倡导仁义的纲领性文件，是一种道德教化的规范。它深深地吸引了乡民，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天晚上就传出庄稼汉子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其影响也立竿见影：白鹿原“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等斗争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

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sup>17</sup>。小说中的白鹿是仁义的化身，是伦理规范的象征，具有神奇的力量，它所到之处，一切美好的东西自然而然地生长，一切丑恶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消失。这个美丽的神话在白鹿原广为流传，实质上勾勒了一幅在儒家思想浸润下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生活蓝图，《乡约》其实就是白鹿精魂的再现。难怪当鹿兆鹏、黑娃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时，乡人嗤之以鼻。实际上，“耕读传家”、“学为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观念已成为白鹿原世代代农民的人生信条和立身行事之本，也是其家族生存的生命力本源，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本分”的生命意志，它是宗法制乡村社会中人们憧憬的理想生活境地。白鹿祠堂实际上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白嘉轩、朱先生是人们的精神之父。正如白嘉轩对白孝武所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角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到祖宗祠堂里头的”。因此，无论是鹿兆海的魂归故里，还是黑娃的浪子回头，都是飘零者对精神之父的追寻，即对传统文化的认同。黑娃从传统文化的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17</sup>

叛逆者到最后对传统文化的皈依□象征了中华民族艰难的“寻父”历程。鲁迅笔下的狂人□发现自己“在无意之中吃了妹子一片肉”时□他真正清醒了□意识到自己与传统文化的深刻联系□于是□狂人病愈□“赴某地候补矣”□重新加入到了吃人者的行列。陈忠实和鲁迅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与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黑娃的回归传统虽然不乏真诚□却也无可奈何□这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当黑娃真正成为一个布衣学子时□他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萎缩和疲惫□甚至想远离世事的纷扰。他对妻子高玉凤说：“我自下山到现在□总提不起精神。……我乏了□也顺了”<sup>18</sup>。昔日金刚怒目、桀骜不驯、充满人性活力的黑娃不复存在了□一个真正有文化理想和人格魅力的道德典范□精神居然如此萎靡不振□这是人的生命的真正浪费。在黑娃身上发生着从人的自然性到历史性的可怕蜕变□他成为文化的载体。身为朱先生的真正弟子□却死于人民政府的枪口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而儒家文化的真正叛逆者白孝文则如鱼得水地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18</sup>

生活在新旧时代。这种描写暗示出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冲击下的日渐式微。小说中朱先生仙逝时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过房檐飘过屋顶便在原上消失了，这预示着一种文化理想的消失，其中蕴含着作者对传统文衰落的悲叹。可以设想，黑娃即使不被枪毙，也难逃朱先生般的厄运，他无法真正融入传统文化，又见弃于革命文化。因此，无论是黑暗动荡的旧时代还是充满理想的革命新时代，都没有黑娃的真正位置，他就像无根的浮萍，孤独的灵魂无处依傍，无以为家。黑娃的精神苦闷和悲惨结局，折射出中华民族在步入现代化以后所遭遇的尴尬处境，象征着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他使作者书写的“民族秘史”具有了沉郁苍凉的意味。

《白鹿原》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感和文化感。作者穿越历史的隧道，以悲悯之情俯视20世纪关中这块热土上芸芸众生的生活，通过个人命运来观照民族历史命运，以生命个体与环境的冲突来展现复杂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的变迁。黑娃的人生道路，映照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展现了民族文化全部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凸显了

传统文化在走向现代社会之后的无可避免的衰落。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人与文化既相冲突又无法分割的关系，烛照出民族秘史的本质及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黑娃的悲剧人生，折射出中华民族的灾难与痛苦。这一形象的塑造，真实地再现了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复杂心态，渗透了作者对民族命运的发展及传统文化未来走向的焦虑和关怀，表达了作者最深厚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体验。

#### 4-儒家文化精神的象征——朱先生

朱先生是《白鹿原》中陈忠实着力刻画重点描写的人物。据作者创作手记来看：“（朱先生）是这部长篇小说比较多的男女人物中，唯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的人物。他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廉，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后一茬中举的举人。”“他在白鹿原讲授学说，传授文化，规范乡约，并且处处以身作则，表现出儒家先贤风范。朱先生去世后，幻化作一只白鹿向西飞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可见，作

者将其作为关中文化和儒家精神的象征。”<sup>19</sup>全书三十四章，朱先生在二十余章中均见出场，足见他之于全书的重要性。而他的出场往往是关键性的，出场后往往会留下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就算是死后几十年，也能够再制造出一个惊心动魄情境来。恰恰是这些故事凸显出朱先生圣人儒雅的形象。下面就具体事例浅析其形象。

### 一.辨怪异引先生出场，举轶事初显圣人儒雅。

朱先生的出场，是白嘉轩遇怪异后，焦急中由自不而然的想引出来的。白嘉轩尊其母及冷先生建议请阴阳先生禳治的途中，内急解手时无意间发现：下了一夜雪后的慢坡地里竟有一坨湿土，看到蓟后进一步刨土，发现蘑菇状奇异物。再三思索权衡下，想到求教姐夫朱先生才是最稳妥的。于是作者借白嘉轩之思插叙出朱先生二三奇闻轶事。朱先生是关中学派程朱理学的代表，其二十二岁时省试头名文举人，因父丧而不赴公车，巡抚方升欲委以重任而婉辞住进白鹿书院，可见其淡泊名利

---

王庆生. 《中国当代文学》. 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第一版<sup>19</sup>

2002年11月第八次印刷. P264页.

，不愿为官。朱先生一到白鹿书院，亲手推倒“四吕庵”大殿内四位神像“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怕是越磕头越昏了！”<sup>20</sup>说明朱先生敢于破除迷信，是一个无神论者，有兴私学而育人子弟之志，其报复可谓远大。朱先生应友邀南方讲学，穿戴无一不出自妻子双手而从头至脚不见一根洋线，可见他传承了耕读传家的美德和因袭了自给自足的封建守旧思想。（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的性格也是有两面性的。）尤其被所谓的南方才子领进烟花楼后，朱先生雷霆痛斥，说明朱先生以古之学者圣人为标榜，不愿随波逐流，自甘堕落。朱先生晴日穿泥屐过村巷而白雨如注之说，从侧面烘托出他通晓天文。“今年成豆”之说是进一步印证他通晓天文。面对群众将其奉若神灵的问卜和神话，朱先生用推倒四座神像做了正面回答：“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不信神！”这进而证明朱先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吃过萝卜丝等饭食后，朱先生“撮进一撮干茶叶，咀嚼良久又吐掉了，用以消除萝卜的气味，免得授课或与人谈话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20</sup>

时喷出异味来。”说明朱先生注意细节并恪守礼仪，俨然是程朱理学的忠实践行者。从朱先生书院住所的陈设来看，无一字画，他是一位不附庸风雅的文人；又从挂着一幅用毛笔勾画的本县地图来看，他是一位胸怀乡里的文人，总之，《白鹿原》第二章中有关朱先生的奇闻轶事第一次确立了他在全书中的圣人地位。其遇事不惊而处之坦若，亦初显儒雅风范。

## 二.壮举显圣德，儒雅伟丈夫。

朱先生不愿出仕，却为县令所用而禁烟。可见其深知烟毒之害，有为救民众于水火而不惜强出头的魄力。他先从妹夫开刀，要挖掉自己手书“耕读传家”的门庭，最后用黑布蒙住了“耕读传家”，蒙住了内心之痛。亲自执犁毁坏烟苗，一呼百应，大有成效，无疑为白鹿原上的一大壮举，（因官府三令五申都屡禁不止，而朱先生登高一呼却自发毁烟。）后因县令换掉朱先生（官府贪图暴利不愿禁烟）而使禁烟流产。由此可见朱先生在白鹿原上的威望之高。威望可以看做是照德行的一面镜子。朱先生在白鹿书院教化乡邻子弟，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是圣人之举，是倍受乡邻仰慕的，他有才但不恃才放狂，为人处世他所秉承的是仁义礼让。是故，他德高，  
威望也就深远了。

白嘉轩一旦有事，有重要的事，就去找朱先生。关于白狼的传言，朱先生认为是“无稽之谈”，关于传闻朱先生斥退二十万清军之事朱先生认为是“传言而已”，但他自己却说乐意当了张总督的说客。而真实的情况却是：  
：面对张总督派来的官差他说：“我正晨读，愿等就等，不等就请他们自便。”<sup>21</sup>足见朱先生不畏权势。算定张总督还会派人来说明朱先生料事如神，而自己避逃之后却主动去见张总督请缨做说客，其办事的原则也太出乎常人意料了。原来，他只身一人前往军营，力劝方升退兵不是为了张总督，而是为了不让关中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可见朱先生胸襟开阔，见识远大，也映衬出他的淡定自若和大智大勇。

朱先生对于剪辫子和放足也有自己的看法：“女人的脚生来原为行路，放开更利于行动算得好事。发为身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21</sup>

外之物，剪了倒省得天天耗时费事去梳理。唯有今后的日子怎样过才是最大最难的事。”<sup>22</sup>可见朱先生并不迂腐，他眼界开阔，为人豁达。在恪守封建礼教的当时，能够这样想足见他有先见之明，并有思想解放之嫌。朱先生对白鹿原村最大的贡献就是拟了《乡约》给白嘉轩，教民以礼仪，以正世风。实际上他践行了以德治人的壮举，在当时来看其思想是非常伟岸而高格的。因生源流失，白鹿书院关闭，朱先生勉强受聘滋水县师范学校教务长，干不了半年就向县长提出了辞呈并提出了重修县志的宏愿。此后朱先生穷其一生在白鹿书院里自己组织了一些同窗及门生开始了浩繁的工作。他和其他封建社会的有所作为的文人一样，在乱世之时，唯有著书立说，各安天命才是明哲之举。

不论是因白嘉轩、鹿子霖在白鹿村办学堂的举动，赢得他热泪盈眶地打躬作揖跪倒拜谢；还是面对刘军长时，买狗守门，把豆腐跟肉熬成一锅，并直言不讳地说：“刘军长你进不了城。”他都有一种“谈笑间檣櫓灰飞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22</sup>

烟灭”的洒脱和“猝然临死而不惊，无故加诛而不怒”的淡然。故而，朱先生之贤明中更大流露出来的却是儒雅

。

得知白孝文私通小娥的过错，他严肃而平静的写了“慎独”二字给这个令他痛心的侄儿，让孝文用一生去慎思笃行，可见朱先生既刚正不阿又声明大义；对小娥的劣迹是深恶痛绝而嗤之以鼻的，以致于听闻其鬼魂作祟时，竟给白嘉轩出了个主意：造塔镇妖。（当然朱先生是不相信有妖的，他认为是人在作祟。）给孝文分家时，朱先生笑着重复“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sup>23</sup>又可见朱先生之幽默诙谐，这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谚语透射出朱先生对于房、地、钱精当剖析的智慧。

朱先生被县府抽去赈济灾民，可谓临危受命。在饥馑之年，举白鹿原而数，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朱先生那样不中饱私囊而以身名正的人了。赈济灾民可以看做是朱先生继白鹿原禁烟运动后的又一壮举，他纯粹是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23</sup>

为了民生而心甘情愿地去“出仕”。朱先生一生“出仕”三次：一是禁烟；二是勉强当了半年滋水师范的教务长；三是赈灾。当然，这只能是从有一定的“权力”这个层面上去看，并不是实质性的出仕做官。由此，朱先生可以说是一位饱经风霜而和蔼的有德老者，是一位集智慧、儒雅于一身的圣人。他是白鹿原上的“寒暑表”，识得原上民众要活着的渴盼与希望，识得民众的温饱疾苦，识得群众心中的愁喜忧乐；所以他成功了，也只有他才能在赈灾后不落下丝毫的口实。他救了白鹿原上数以万计的苍生，其功德足以与白鹿原永存不朽。

无论是面对共产党员鹿兆鹏、白灵，还是面对国军鹿兆海，保安团营长白孝文，以及是关门弟子的土匪鹿兆乾时，他都散发出一种出知人则哲的圣贤风范和处事不惊的儒雅形象。朱先生对鹿兆鹏这个共产党员是有恩的，为其提供避难场所，并在一次次的对“政府”失望后，断言说“天下注定是朱毛的”可见其明断的魄力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土匪黑娃被保安团白孝文俘获后，朱先生的举动更使人匪夷所思，他亲自送信给孝文，甚至想

办法解救黑娃，他所坚信的是：要一个人的命容易，让一个人变好难！只要这个人变好了，哪怕以前是魔鬼也未尝不可以原谅！朱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有佛心的人，而佛心是圣人必须具有的心灵。朱先生是圣人，所以给黑娃写了“学为好人”四个字勉之，并破天荒地收了这个土匪为关门弟子。而朱先生对白灵则有一种淳厚的亲情，对于这个侄女，他有一种振憾心灵的似曾相识感觉。也许要说朱先生有愧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解白嘉轩与朱白氏之梦后，他知道白灵完了，但他没有说穿。他是不想、也不忍，无论是作为姑夫还是作为朱先生。对于兆海的死他悲痛过，甚至为兆海守灵，他也有泪，他宣誓赴死抵倭寇，但得知兆海之死的真相后，他很平静，平静得出奇，平静得要命。他是一位时常有出乎人意料之举的智者，他替兆海痛心，为“政府”寒心。

### 三.魂归白鹿书院，儒雅流传千古。

白鹿原震人心魄之“死”字，令人窒息难耐到浮沉梦幻般地步后，豁然映射出人身最后归程的悲壮之美。尤其朱先生之死，平静的悲壮中彰显出最后的儒雅。朱先生

让妻子朱白氏“你再给我剃一回头”<sup>24</sup>似乎就已预知自我生命的终结。实际上，当石印馆先生出于对朱先生仰慕和悲悯之情印好十套《滋水县志》并送来给朱先生时，他就无憾了。当他亲自把八套县志送给编纂过它的八位先生，一套托人送给县长，一套留给自己，而了却最后一件心事时，他就知道自己的大限来临了。所以“朱先生顿觉自己变轻了”，[12]让朱白氏叫来全家人到白鹿书院吃团圆饭。实际上他已选好了自己的栖魂之处：这个教化乡邻子弟的圣地，成就“立言”壮举的雅居，为之耗费毕生精力的精神家园——白鹿书院，就是他的栖魂之处。面对死亡，他很平静，只是把它当作归程，所以他是儒雅的。“剃完了，我就该走了。”这是朱先生死前最直白自己将死的一句话了。其实，七天前他就写好了遗嘱。朱先生死得很平静，他壮志得酬，可谓死得其所，他可以顶天立地了，上不愧天，下不愧地，故而遗嘱：“不蒙蒙脸纸。”人终究会死的，人生就是一个悲剧。而朱先生之死可以用悲壮了，因他壮志得酬了。而“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24</sup>

不用棺材，不要吹鼓手，不向亲友报丧，不接待任何吊孝者，不用砖箍墓”的葬法的确简单到不能再减了。这的确是圣人的举动，也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样：死了也要反对铺张浪费！试问世间到死都能以身作则的有几人？朱先生就是朱先生：“五十多里路途之中几十个大村小庄，烛光纸焰连成一片河溪……”<sup>25</sup>这是白鹿原人民对于他的肯定，对圣人自发自觉的由衷缅怀。“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正是黑娃这样一个土匪，一个半路入门的弟子，中肯品评了朱先生的一生。朱先生可以瞑目了，教化贤徒三千，也抵不上引导一个十恶不赦之徒走上正道。这是朱先生“立德”“立言”之外的功上之功，所以他无可争辩的成了《白鹿原》之圣人。值得一提的是：朱先生死后几十年的一天，当批林批孔运动抨击到“克己复礼”思想时，一群学生挖了朱先生的坟，生产队长想用墓砖箍井的愿望落空了，安葬朱先生时遵从遗嘱而没有用砖。红卫兵们只捡到一块合砖，两面却各刻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而愤怒者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25</sup>

摔断合砖后，中间却发现了“折腾到何日为止”的字样。学生和村民惊呼了，难道朱先生真有未卜先知之能？笔者主观认为：作者之所以附加此段小插曲，一是为了进一步证实朱先生简葬确有此事；（映衬其伟岸高格的儒雅和圣人般的举措）二是为了神话朱先生。只有像朱先生这样有大气魄的儒雅文人才能称得上圣人，以至死后数十年数百年仍为群众所乐于称道，乃至流传其奇闻轶事不绝。总之，《白鹿原》第三十二章是朱先生的谢幕演出。凋零的是朱先生的生命，其德其名永葆长青，流芳白鹿原千古。

#### 四.朱先生圣人儒雅形象所寓寄的现实性。

朱先生是《白鹿原》上的圣人，其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其圣人儒雅形象的确立绝非偶然。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兆濂确实曾主编过《蓝田县志》，也曾义愤填膺地发表过“抗日宣言”。至于把牛才子传得神乎其神主要归功于朴实的乡民，源于他们发自内心真实的崇拜。就如同作者的父亲一样，基于对牛才子的崇拜才不止一次地讲述牛才子的奇闻轶事给幼年时作者听。由是，“这

个带着神秘色彩的牛才子，从童年起便成为我一个永久性的生活记忆。”<sup>26</sup>故而，朱先生圣人儒雅形象的形成就是真实原型与轶事奇闻通过乡民“神化”而杂糅的产物。当然，在此形象的确立的过程中作者始终萦绕着一种对文人品格的思考。或许作者对家乡所出的这位牛才子“立言”、“立德”之举流露出难于言表的赞许正是出于对其豁达而无为的文人情怀的仰慕与向往。总之，《白鹿原》作品的现实性赋予朱先生超凡脱俗般飘逸而灵俊的圣人儒雅形象，朱先生的境界就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文人境界。

综上所述，《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堪称圣人，其言行举止、所作所为，无一不称儒雅。他虽无诸葛孔明“羽扇纶巾”之飘逸般地超凡俊雅，却也有：只身一人从容舌战方升，斥退二十万清军而不动声色的从容风雅；虽无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隐的洒脱，却也有赈济灾民而不占一粒之米的心安理得；其主编的县志虽比不上太史公司马迁之绝唱誉冠千古，却也不失为

---

陈忠实. 白鹿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sup>26</sup>

滋水县之“和氏璧”而流传一方。总之，朱先生在《白鹿原》演义了太多的惊心动魄，留给人们的一字字、一句句、一幕幕就都是真真切切的誉叹！圣哉朱先生！儒雅  
哉朱先生！

### المراجع:

1. 王渭清. 《白鹿原》人物形象的人格治疗学意义探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3.
2.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3.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4. 尤龙.极端的教育.因袭的负重——白嘉轩家长文学形象解读[J].青年文学家, 2010, (16) .

5.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6.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7. 陈忠实. 白鹿原 [M]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8. 王庆生. 《中国当代文学》. 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第一版2002年11月第八次印刷. P264页.
9. 陈忠实. 白鹿原 [M]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